



五台山的故事

■ 李广义



宋太宗感圣插箭岭 张商英祈雨罗睺殿

话说五代十国时期,中国大地 53 年的乱世中,有几十位帝王你方唱罢我登场,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。这时候,原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从历史中走出,他先是陈桥兵变,黄袍加身做了皇帝。紧接着又杯酒释兵权,强化了中央集权。他的出现,不仅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 200 年藩镇割据的局面,也为宋王朝以后的延续筑好了基业,因此,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成功而有成就的帝王。这位军人出身的帝王,不仅智勇双全,政治上也还开明,他对待思想文化战线,总的原则是兼容并蓄而为我所用,认识到佛教对封建统治也不无裨益。故他允许佛教的存在和发展,给以适当的保护。下诏对后周世宗时未废毁的寺院,着手修复,留下来的要妥善保存。其中最重要的运作是,选派了 157 名僧人西行求法,寻求新颖的佛教思想,还组织刊刻大藏经,以充实和丰富传统思想文化。他还下诏禁止大型的佛事活动,不允许僧尼夜集士女开展宗教活动,表明了他允许佛教发展,但要适度和有节

制的态度,充分说明了宋太祖对待佛教的政策是明智之举,也可说为北宋的佛教政策定了基调。

北宋皇帝和五台山佛教,颇有因缘的是太宗、真宗和仁宗。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,据说从小由太祖一手拉扯成人,又靠着他和母亲和太祖的口头协议,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有的历史家认为,宋太宗赵光义比赵匡胤要残忍(赵匡胤及儿子赵德昭的死,还有弟弟赵廷美的死,均与他有关),但他执起政来却宽松敦厚。这位非武人做天子的帝王,武功自然不怎么样,但他在伐北汉这件事上,应该说还算不错,彻底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。但当他回过头来再次征辽时,果然就露出了马脚,在高粱河的一场激战中,被辽军打得大败,背上中了一箭,险些被擒。攻辽的败绩,对这位帝王影响极大,从此余悸惊梦,种下了软弱的祸根。可见一个帝王的作为影响,对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。正因为宋太宗武功不行,只好一头扎在文治上大做文章,据说弄得还颇有建树,还渐渐出现了些太平的景象。故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,免不了时常用佛教来装饰一



下太平。

宋太宗即位后开始崇佛敬僧，第二年即改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，第三年又赐天下无名寺额为“太平兴国”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设立译经传法院，御制新译三藏圣教序，令人修撰了《大宋高僧传》等佛教典籍，还令度天下童行为僧（即位期间，共度僧 17 万余人）。此外，他还要求朝内文武大臣，也要尊奉和保护佛教，又大力敕建寺塔，在内殿建立道场。这位武功平平的帝王，在这方面却身体力行，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。他和五台山的因缘还有一段故事传说：相传宋太宗初即帝位，极想建立功业，故灭了北汉后，即乘胜北伐征辽。他带兵进入五台山，在南台南的一座山岭下宿营时，晚上忽见岭头出现了一圈白光，继而在光中看到一尊金身八臂文殊像。太宗惊异之极，想到征辽大队人马进入文殊灵境，佛菩萨慈悲，定是不乐干戈，因此显圣。于是他伏地再拜，发誓护持庄严五台山道场。又在岭头上插了一支御箭，命令士兵以此岭为界，不准进入腹地，退兵绕道而行。南台插箭岭即由此而来。上述故事虽系传说，但和历史实际也没多大出入。据说当时宋太宗确实来过五台山，他在刚刚收复晋阳之后，就在太原的平晋寺，诏见了五台山鹿泉寺沙门睿谏，询问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情况，赏赐了睿谏许多财物，命他即刻将简陋的鹿泉寺，改建为太平兴国寺。《清凉山志》还记载了他平晋之后，五台山真容院净业大师，向他进献《山门圣境图》和《五龙王图》。当皇帝正御览之时，天空突然一声巨雷，大雨瓢泼而下，太宗大惊。净业大师说：“五台龙王见驾，今二龙相会，故得瑞雨。”宋太宗听了大喜，遂赐号崇教大师，命为五台山僧正。接着，宋太宗下诏：“五台深林大谷，禅侣幽栖，尽蠲税赋”。第二年（即太平兴国五年），即敕令在五台山重建真容、华严、寿宁、太平兴国、竹林、金阁、法华、秘密、灵境、大贤十大寺，对五台山佛教圣地，可谓是护持有加。

宋太宗扶植五台山佛教，庄严五台山道场，做得也很到位。他不仅免了五台山的税赋，还在

派遣蔡廷玉等诏修五台山十寺时，为保证建寺所需，特敕河东路有司运送给财物，又安排沙门芳润担任十寺僧正。十寺建成后，即赐额鹿泉寺为太平兴国寺。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，宋太宗还命太原、成都两地铸造铜钟，分别赐于五台、峨眉两山。挂钟之日，两山各由梵僧十个，组成为首的奉迎铜钟队伍，一路洪钟声声，声闻百里，浩浩荡荡，显示了帝王奉佛的排场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宋太宗在所修的台山十寺中，选定了唐代时文殊菩萨显圣的真容院为皇家寺院，格外优待。一是派中使，专门为真容院送来金泥书经一藏，命“每岁度僧 50 人，令事清修”。二是在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，令内侍张廷训，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，安奉于真容院。淳化二年（991），宋太宗又命五台山每年度僧 50 名，其中，规定真容院每年度僧 20 名，这样，他在大兴五台山佛教的同时，也将真容院开辟为皇家道场，使其成为诸寺之首。由于皇帝的扶植，五台山不仅寺庙重换了新颜，佛教也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景象。

宋真宗赵恒，也是一位颇重文治的帝王。前期虽说忙于政事，也出现过咸平之治的小康景象，但他一手策办的“澶渊之盟”，以巨额的经济代价换取契丹、党项的和平，无疑又给宋朝植入了弱软的基因。真宗后期沉溺于迷信，广建道场，祭天祀地，普度道释童行，敬重佛法。他不仅自己著作（有《圣教序》、《宗释论》等），还大开梵学进行译经，还组织好佛的宰辅词臣，如王旦、王钦若等为译经润文，在朝廷中掀起了一股崇佛的热潮。他批准太宗七女吴国大长公主，还有密、曹两王女及后宫 30 多人出家，其时全国僧尼达到 46 万，其崇佛可说胜于先朝。所以，他对五台山的佛教，也是护持有加。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赐钱一万贯，对真容院再加修建，并建两层十三间大阁，赐额奉真阁，并设文殊像，其绮焕殊丽，映曜林谷。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又降五台山普度童行。接下来的仁宗皇帝赵祯，也很尊奉扶植五台山佛教，他选中了五台山高僧崇庆撰写的《大藏经名》、《礼忏经》，命译经院刊订后颁行于世。又命善住院道高德重的和希法师为



僧统(其弟子即为成觉大师),驻清凉寺(该寺在宋代设僧正司),赐号慈懿大师,管理全国僧尼事。由于这三朝帝王眷想灵峰,流光五顶,其时敕送五台山的“天书玉札”,就达380多轴,“清凉之兴,于时为盛”。当时全山有寺73座,僧人数量仅次于唐代,出现了唐代以后少有的兴盛局面。

却说宋代时,儒道释经过长期的争论斗争,佛教中的一大批既通禅理,又具文采的禅僧脱颖而出,其禅学思想,影响着儒家理学的形成。经过五代十国社会动乱的士大夫阶层,此时处于内忧外患和新旧党争的夹缝之中,感到世事难以预料,便纷纷与禅僧交接,自我陶醉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,就是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张商英等人,而张商英则是对五台山的佛教发展,有过重大贡献的一位居士。

张商英,字天觉,号无尽居士,今四川新津人,为北宋大臣,官至监察御史,后为徽宗时丞相,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,一位典型的维摩诘式的居士。张商英魁梧洒脱,一表人材,胆识过人,辩才无碍。相传他十几岁到京城应试时,有位向氏预先梦见神人对她说:“明天迎接相公。”第二天,途经向氏家的张商英果然到了,向氏很是惊诧,便说:“秀才如果还没娶妻,我愿意将女儿嫁给你。”张商英起先推辞,向氏便说:“你是怕考不中吗?如果考得不理想,我也不会毁掉婚约。”张商英果然进士及第,便娶了向氏的女儿。

张商英进士及第,不久担任主簿,一次他进入僧寺,看到寺里整齐的佛教金字金书,非常气愤地说:“我孔圣之书,难道还比不上胡人经书那么让人敬仰吗!”遂在晚上坐在书院,吮笔研墨,凭纸长叹。夫人向氏叫他说:“官人,夜深了怎么还不睡觉呢?”商英说:“我正在写《无佛论》。”向氏说:“既然无佛,那还有什么可论的呢?你应该写《有佛论》才对。”张商英对夫人的话,一时半信半迷,终于停笔。后来他拜访一位同事,看到佛龛前的《维摩诘经》,打开一看,触目的一句话是:“这病不严重,但也不会不严重”,便感叹地说:“原来胡人的话也很好啊!”便

向同事把这部经借回去阅读,这时夫人向氏对他说:“你可以熟读这部佛经,然后再写《有佛论》了!”张商英对夫人所说甚感惊异,从此居然深信佛道。

这故事出自五灯会元,表面看去,张商英进入佛门,是由于夫人向氏的指点,实则是《维摩诘经》引力的使然。《维摩诘经》中所描述的维摩诘居士,是佛陀时代毗耶离城的一位大富翁,他精通佛理,辩才无碍,连文殊菩萨也要敬他三分。他家财万贯,妻妾成群,但这么个安享富贵的人,在《维摩诘经》中,则被认为是入俗化人的大菩萨,因而历来迎合了世俗贵族士大夫们的心态。张商英看中的,正是既能贪图享受,又能出污泥而做佛,故而从此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张商英做了居士后,喜欢谈禅论道,虔诚学习禅典,先后拜访从悦、大慧、克勤、报恩等禅师,由于他的佛学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,还闹了不少笑话,但他佞佛喜禅,维护佛教,倒还专一真诚。

看破红尘爱红尘的张商英,一脚踏入仕途,就是在熙宁变法、元佑更化、蔡京专权中度过的。在新旧两党的激烈斗争中,张商英往往慷慨放言,但又见机行事,表现出了他的不稳定性。他先是由章惇推荐,受到王安石重用,支持过王安石变法。但在旧党文彦博的反对声中,则称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,却又对元佑全面否定王安石的变法,提出了疑义。这种论调似乎和苏轼的意见相左,因此他借此写信给苏轼,大拍马屁,苏轼认为此子“虽俊可喜,终败人事”,没有上他的圈套。章惇为相,新党执政后,张商英又上书,攻击苏轼、司马光、文彦博等一班元佑旧党,结果苏轼遭贬。到徽宗时,皇帝认为蔡京久盗国柄,中外积怨,而张商英却能立同存异,是为贤者,后来才拜他为宰相。在商英任宰相极短的时间里,也办了一些为国为民的好事,后又因事降为观文殿大学士。在仕宦道路上,可看出张商英常常观风使舵,依附不定,但尽管他这样,在封建皇权复杂的斗争中,总免不了沉浮升降的命运。



张商英诚信佛教,自称是文殊眷属,因此和五台山结下了深厚的情缘。据说他先是学着武则天,在元佑二年(1087)二月,神神兮兮梦游了五台山金刚窟。接着,就在他被贬为河东提点狱时(十一月),踏着冰雪,在严寒中第一次来到五台山,瞻礼了金刚窟,经过他的验证,认为金刚窟“皆与梦合”。元佑三年(1088),张商英第二次来到五台山,这一次他住了好几天,游历了好多寺庙圣迹。六月二十七日,他在佛地一路走来,见南台之侧白云绵密,于是急忙换上公装,焚香一拜未起,即见云中显出了金桥和金色相轮。晚上他在真容院栖止时,又见到龙山出现了黄金宝阶,北山出现了大火炬(圣灯)。张商英此时一拜在地,又见东台龙山、罗睺殿左右各现一灯,浴室后、金界南溪上也各现二灯。张商英注目而望,见所显圣灯忽大忽小,忽红忽白,分分合合,照耀林木。此时他跪地祷告说:“若非人间灯者,愿至我前”,话未说完,忽见溪上之灯如红日浴海,腾空而上,放大光明。俄尔,渐渐收束,来到阁前,变成一颗小火珠。接着,又见到溪上出现金色之身,细看时,却是冉冉而上的天龙八部。又一日,张商英在中台顶上,见五色祥云纷纷郁郁,西北开朗处,显出碧琉璃世界,并出现了一万菩萨仪仗,还有楼殿宝台。他在文殊真容殿,又见到文殊坐于狮背上,同七位尊者升降游戏。在北台山畔,他看到了红火炬,金银灯,于是跪地又拜说:“愿现我前。”话毕,果然那些灯一一飞来,又一一复归原处。接着,张商英在一路纷繁的异象中,又游了玉华、寿宁两寺,后归真容院,见到松树上群灯连珠。

张商英在五台山,简直是呼佛要灯,无所不应。他由僧俗人等陪同,在游览梵仙山时,看到山头紫气缭绕,便对陪同他的官员说:“紫气之下,必有圣贤。”话未说完,果见山头出现了楼阁宫殿,诸位菩萨在其中庄严说法。张商英又说:“愿显仪仗。”言毕,佛家仪仗果然出现。在栖止的真容院清辉阁,在他的要求下,众圣灯再次出现,张商英又发愿说:“我若于过去世是文殊师利眷属,愿益见希奇之相。”言罢,即见两灯上下

跳跃,交舞四次。以后,张商英又在秘魔岩见了文殊骑狮像,看到等身白光菩萨三现等等一系列的灵瑞异象。

张商英自称是文殊眷属,所以他在五台山,能够随意调动各种灵瑞异象,自然,他本人也常以一位圣者的姿态出现。其时并州大旱,张商英以“文殊眷属”的身份,几上五台山祈雨,元佑四年六月那次,当他至罗睺足迹殿,礼拜了罗睺圣迹,安奉了自塑的文殊菩萨圣像时,忽见殿顶宝盖上出现了数盏金灯,继而,又在晚上看到殿左右出现了十大金灯。当他三跪九叩,礼拜了文殊菩萨,心满意足地离山出行,当走到代州时,又一个奇迹出现了。天空忽然浓云密布,大雨铺天盖地而来,干枯的田禾也顿时变得丰绿了,这在张商英来说,他在五台山祈雨,真是灵验之至。不甘人下的张商英,他作为文殊眷属,既能感通大圣,又能祈得灵雨,越发证实了他的非凡之处。所以他对五台山的佛教,虔诚护持,责无旁贷,除捐钱3万贯,兴建了菩萨顶、罗睺寺外,还办了两件佛界称道的好事。一是请求皇帝批准,将边臣占去的三百顷田地归还了佛寺;二是应寺僧们的要求,将自己在五台山的见闻,撰写成《续清凉传》(上、下集)公诸于世。《续传》虽多夸张其词,但它面世后,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,众多佛徒信众闻之,纷纷前来礼拜文殊,使五台山的佛教,又出现了新的繁荣。因此说,张商英是对五台山的佛教,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位名公护法。至于张商英本人,他借助五台山特有的地质气象,文殊信仰,神化自己,抬高身价,为他爬上高位大造舆论,因此也扩大了影响,到后来还终于当上了丞相。这在他看来,恐怕又是佛菩萨保佑的结果了。我们看他做的一首《咏五台》的诗,就是以文殊眷属的口气写的,感情也还真挚,又写出了五台灵山的特色:

五顶嵯峨接太虚,就中偏称我师居。

毒龙池畔云生燥,猛虎岩前客过疏。

冰雪满山银点缀,香花遍地锦铺舒。

展开坐具长三尺,已占山河五百余。